

# 农村家庭社会资本的减贫效应研究

孙剑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湖南省长沙市, 410079)

**摘要:**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 农村家庭在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网络、信任、团结与参与; 以及随之而来的便利资源和信息等社会资本, 正是农村家庭可获及、可支配的重要资源之一。在“造血”减贫思维指导下, 研究社会资本对于减少农村家庭贫困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研究即围绕农村家庭社会资本的减贫效应来展开: 对社会资本的减贫效应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 农村家庭的社会资本及其四个维度: 社会资本的信任与团结维度、信息获取与传播维度、集体行为维度、社会网络维度都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 中介效应分析表明, 农村家庭的社会资本能通过信贷约束缓解机制和非农就业促进机制来发挥其减贫效应, 且正规信贷约束缓解机制的中介效应要强于非正规信贷约束缓解机制。并进一步地有针对性地提出农村家庭减贫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农村家庭, 社会资本; 减贫效应, 乘积分布法; Sobel 法

**中图分类号:** F832      **文献标识码:** A

## 1. 引言

1978 年至今的 40 多年间, 改革开放的春风几乎吹遍神州大地, 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卓有成效, 农村贫困人口在 2019 年底进一步减少到了 551 万人; 转眼到 2020 年, 中国迈向脱贫攻坚的最后胜利, 摆脱了绝对贫困。当前农村减贫工作自然进入到攻坚之后的巩固和进一步深化阶段,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 摆脱相对贫困、增强个体内生发展动力是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 减贫思维从简单的“输血”转变为更为自主、科学和可持续的“造血”, 即改善农村家庭生计以及提高其福利水平的出发点应从“农村家庭缺少什么”转变为“农村家庭现在有什么”。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 根植于“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是农户可控制、可支配和可获及的重要资源之一, 社会资本甚至被视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并行的第三大资本, 它包含着农村家庭在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网络、信任、团结和参与; 以及随之而来的便利资源和信息等多个维度; 在“造血”减贫思维指导下, 个体的社会资本的作用也得到了较多学者的关注。

由此, 社会资本是否具有减贫效应并且其减贫效应如何? 同时, 除了直接的减贫效应外, 社会资本间接影响贫困的效应如何? 除了信贷约束, 社会资本是否能够通过其他变量传导进而缓解贫困? 进一步地, 基于社会资本——信贷约束缓解——减贫的传导路径, 这种信贷约束缓解机制在农村正规与非正规信贷之间是否存在区别? 本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基于 CFPS2018 调查数据, 通过因子分析法构建我国农村家庭社会资本的综合指数并对其进行测度、同时参考他人研究构建农村家庭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对多维贫困进行测度; 对社会资本的

直接减贫与间接减贫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社会资本的直接减贫效应与间接减贫传导路径,并进一步地比较社会资本减贫的正规与非正规信贷约束缓解机制。

## 2. 文献评述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对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分类及测度方面的研究较为丰富,虽然不同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需要对社会资本采取了不同的概念界定、分类与测度方式,但其中存在着共识:社会资本概念具有多维性,基于此,本文认为农村家庭的社会资本是指,农村家庭在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网络、信任、团结和参与;以及随之而来的便利资源和信息渠道等;同时关于多维贫困也有许多过往研究可以参考。

但过往研究尚未针对我国农村家庭实际情况,建立统一、普适的社会资本综合指数;同时在社会资本缓解贫困作用方面存在着观点分歧,且鲜少基于我国农村特点对社会资本缓解贫困的直接机制与传导机制进行分析。基于上述不足,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一是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农村家庭社会资本综合指数,同时参考前人研究构建农村家庭多维贫困指标体系;二是通过梳理已有文献和相关理论对社会资本减贫的直接机制与间接传导机制进行理论分析;三是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对社会资本的直接减贫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分别基于乘积分布法和 Sobel 中介因子检验法实证检验信贷约束和非农就业在社会资本减贫中的中介作用,同时基于社会资本——信贷约束缓解——减贫的间接传导机制,通过实证研究对比农村家庭社会资本减贫的正规与非正规信贷约束缓解机制。

## 3. 农村家庭社会资本及多维贫困的测度

### 3.1 农村家庭社会资本的测度

#### 3.1.1 社会资本综合指数构建

本文首先提取了 CFPS2018 调查问卷中农村家庭社会资本的相关问题,至于有哪些问题是与社会资本相关的问题,过往研究尚未形成对社会资本统一的衡量标准,因此在对社会资本指标的选择上也是各有千秋。本文则结合自身研究目的和所采用的问卷调查数据,选取了与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团结、集体行为以及信息渠道等相关的变量指标,以期对社会资本有一个普适的衡量标准。遵循以上原则,本文的社会资本指标体系包含如下指标:一是家庭人情礼金支出,该指标是农村家庭社会交往网络广度的一个具象体现,如果一个农村家庭的人情礼支出较多,意味着其可能有着较广的社会交往网络;考虑到调查问卷中各个家庭的人情礼支出具有较大的差异性,本文对人情礼支出的原始数据作对数处理(若原始数据为0,对数处理后数据仍保持为0);二是家庭中是否有成员是退伍军人以及家庭中是否有成员是党员,该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家庭参与集体行为、集体决策的程度;三是农村家

庭中是否有成员是工会成员以及是否有成员是个体劳动者协会会员,参与公会或者个体劳动者协会往往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更广泛的社会网络和信息获取与传播渠道;四是农村家庭的人缘及对邻居、干部和陌生人的信任度以及社会地位,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因此,农村家庭的人缘也是其能获及和支配的重要社会资本,而与信任度相关的三个指标则考察农村家庭对外界的信任程度,同时农村家庭的社会地位越高,其社会资本可能越丰富。

### 3.1.2 测度结果

表 3.1 计算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社会资本各维度以及社会资本综合指数的平均值,以平均水平来看,除了社会网络维度以外,我国西部地区农村家庭有着丰富的社会资本。虽然从过往数据来看,东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对外开放程度相对西部地区较高,但西部地区也正是在这样相对较为闭塞的条件下,农村家庭之间基于血缘、地缘而形成的信任与团结关系更加紧密,有着自己独有的信息获取和传播渠道,这也正是农村家庭尤其是西部地区农村家庭减贫可以利用的重要抓手之一。

表 3.1 东中西部社会资本各维度及综合指数平均水平

	东部	中部	西部
信任与团结维度 Soc_1	9.7137	9.7694	10.5465
信息获取传播维度 Soc_2	9.8962	9.9644	10.0752
集体行为维度 Soc_3	9.9535	9.9873	10.0461
社会网络维度 Soc_4	10.0788	9.9751	9.9135
社会资本综合指数 Soc	9.8462	9.8746	10.2720

## 3.2 农村家庭多维贫困的测度

### 3.2.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与数据来源

本文对于农村家庭多维贫困指标体系的构建主要遵循三个原则,其一是借鉴各贫困指数及国内外学者的常用变量,其二是结合我国国情;其三是依据 CFPS 调查问卷的数据可得性。由此,本文构建了包括收入、健康、教育、医疗、生活标准、住房、土地和资产 8 个维度共 9 个指标的农村家庭多维贫困指标体系。

量化贫困分为识别贫困和加总贫困两步,前者是后者的重要前提。并集法、交集法和 A-F 双界限法都可以用来识别贫困。曾有一项研究表明,对于同一研究对象,总人口中贫民人口的比例在用并集法识别贫困时比用交集法时高出近 97%,可见并集法和交集法虽然都操作简单且易于理解,但在识别贫困时前者显得过于激进,而后者则显得过于保守。考虑到这些问题,本文则采用了介于并集法和交集法之间的 A-F 双界限法来识别贫困,其主要步骤如下:

一是识别多维贫困。设农村家庭样本数为  $N$ , 评估家庭贫困水平的指标个数为  $D$ ; 设由所有样本值构成的矩阵为  $Y_{N \times D}$ , 农村家庭  $i$  在维度  $j$  上的取值为

$y_{ij} \in Y_{N \times D} (i = 1, 2, L, N, j = 1, 2, L, D)$ 。

识别每个家庭在各维度上是否贫困的依据是贫困标准, 设该贫困标准为  $z_j$ 。若  $y_{ij} < z_j$ , 则农村家庭  $i$  在维度  $j$  上贫困; 否则为不贫困。为便于计算, 令  $g_{ij}^0 = \begin{cases} 1, & y_{ij} < z_j \\ 0, & \text{其它} \end{cases}$ , 于是样本矩阵  $Y_{N \times D}$  可以变换成剥夺矩阵  $g^0 = [g_{ij}^0]$ 。

其次, 运用多数学者采用的等权重法确定各指标权重  $w_j$ , 通过加总可得到农村家庭  $i$  在所有维度上的总剥夺得分,  $c_i = \sum_{j=1}^E w_j g_{ij}^0$ 。

最后, 设定临界值  $k$ , 判断农村家庭是否为多维贫困。如果  $c_i \geq k$ , 则该农村家庭属于多维贫困; 否则不属于多维贫困。进一步地, 令  $c_i(k) = \begin{cases} c_i, & c_i \geq k \\ 0, & \text{其它} \end{cases}$ , 于是剥夺矩阵  $g^0$  可以转换成审查剥夺矩阵  $g^0(k) = [g_{ij}^0(k)]$  且  $g_{ij}^0(k) = g_{ij}^0 c_i(k)$ 。

二是多维贫困指数构建。如前文所述, 识别贫困之后应当对贫困进行加总成综合指数, 进而对农村家庭多维贫困水平有较为全面和具体的评估。本文基于 A-F 理论构建多维贫困指数的指标体系。

多维贫困发生率 ( $H$ ):

$$H = \sum_{i=1}^N c_i(k) / N = q / N \quad (3-1)$$

上式表示多维贫困的家庭比率; 其中,  $q$  为发生多维贫困的家庭数,  $N$  为总家庭数。

多维贫困指数 ( $MP_0$ ):

$$MP_0 = HA = |g^0(k)| / N = \sum_{j=1}^D \sum_{i=1}^N g_{ij}^0(k) / N \quad (3-2)$$

其中,  $A = g^0(k) / q = \sum_{j=1}^D \sum_{i=1}^N g_{ij}^0(k) / q$  计算了农村家庭被剥夺的维度数与多维贫困家庭数的比值, 因此被称为平均缺失份额。相较于  $H$ ,  $MP_0$  更能深入反映贫困农村家庭的情况, 因此又被称为调整的多维贫困发生率。

本文采用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ISSS) 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数据, 其对于数据的收集力图做到全方位和立体化, 通过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 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等的变迁, 为众多学术研究和公共政策分析提供了数据基础。CFPS 是一项全国性、大规模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 样本基本覆盖了全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 调查对象包含样本家庭中的全部家庭成员, 为本文研究农村家庭的经济与非经济福利提供了便利。考虑到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发展, 本文选取了最近一次跟踪调查数据, 即 CFPS2018。同时结合本文的研究情况, 对原始样本数据进行了以下数据处理: 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农村家庭, 因此在全体样本中筛选出农村样本, 依惯例去除缺失样本, 接下来将同年度的家庭、成人和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进行对应合并, 之后将具有相同家庭编码的同以家庭的成员数据进行平均化处理, 以此作为该农村家庭相应的取值。经过数据处理之后, 本文一共得到 6475 个农村家庭数据。这些数据基本覆盖全国, 且东中西部样本数量分

布也较为均衡；其中东部地区共 2282 份有效数据；中部地区共 1839 份有效数据，西部地区共 2354 份有效数据。

依照前文构建的农村家庭多维贫困指标体系，本文结合 CFPS 调查问卷对多维贫困各指标进行了具体的解释，并设定了相应的贫困线标准。

表 3.1 农村家庭多维贫困指标解释与赋值

维度	指标	指标解释与赋值	临界值
收入	人均纯收入	家庭人均年纯收入（2018 年标准）	3535
健康	健康状况	家庭成员健康状况	3
教育	人均受教育年限	家庭人均受教育年限	9
医疗	医疗保险	家庭成员是否都参加新农合（是=0，否=1）	1
生活标准	做饭用水	家庭做饭用水来源，江河湖水、雨水、窖水、池塘水/山泉水=4、井水、自来水、桶装水分别赋值 1~7	4
	做饭燃料	家庭做饭燃料来源，柴草、煤、灌装煤气/液化气、电、天然气、太阳能/沼气分别赋值 1~6	2
	住房	住房面积 家庭人均住房面积	12
土地	土地状况	家庭从集体中分配到土地的状况（有=0，没有=1）	1
资产	实物资产	家庭拥有耐用消费品状况（有=0，没有=1）	1

### 3.2.2 测度结果

如表 3.2 所示，本文从全国角度测算了 2018 年我国农村家庭的多维贫困水平；又分区域进行了相应的测算，这有利于准确把握各区域间农村家庭多维贫困状况的差异，为更加精准地因地施策奠定基础。其结果分别见表 3.3、表 3.4、表 3.5。

表 3.2 2018 年农村家庭多维贫困指数值（全国）

k	0.3	0.4	0.5	0.6	0.7	0.8
H	0.2453	0.0831	0.0286	0.0051	0	0
A	0.4245	0.4768	0.5517	0.6553	NaN	NaN
MP <sub>0</sub>	0.1041	0.0396	0.0158	0.0033	NaN	NaN

表 3.3 2018 年东部农村家庭多维贫困指数值

k	0.3	0.4	0.5	0.6	0.7	0.8
H	0.2766	0.1066	0.0569	0.0344	0	0
A	0.3366	0.3391	0.2533	0.0741	NaN	NaN
MP <sub>0</sub>	0.0931	0.0362	0.0144	0.0025	NaN	NaN

表 3.4 2018 年中部农村家庭多维贫困指数值

k	0.3	0.4	0.5	0.6	0.7	0.8
H	0.8059	0.8059	0.8059	0.8059	0	0
A	0.0917	0.0367	0.0141	0.0025	NaN	NaN

MP <sub>0</sub>	0.0739	0.0296	0.0114	0.0020	NaN	NaN
-----------------	--------	--------	--------	--------	-----	-----

表 3.5 2018 年西部农村家庭多维贫困指数值

k	0.3	0.4	0.5	0.6	0.7	0.8
H	0.3275	0.0922	0.0323	0.0072	0	0
A	0.3714	0.4784	0.5543	0.6507	NaN	NaN
MP <sub>0</sub>	0.1216	0.0441	0.0179	0.0047	NaN	NaN

从中可以发现,与全国状况相同,东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家庭多维贫困指数值也是随着临界值  $k$  的增大而不断降低,并且皆是在  $k$  取 0.6 时,接近于 0。同时将全国农村家庭多维贫困指数值与分区域的农村家庭多维贫困指数值进行横向比较可知,东中部地区的指数值皆显著小于全国整体水平;而西部地区的指数值则显著高于全国水平,这表明西部地区农村家庭的多维贫困程度比全国整体程度要更加严重。

## 4. 农村家庭社会资本减贫效应的实证分析

### 4.1 模型与变量选取

参照已有研究经验,本文设计如下 OLS 实证模型:

$$M_{0i} = \beta_0 + \beta_1 Soc_i + \beta_2 X_i + \varepsilon_i \quad (4-1)$$

其中,  $M_{0i}$  表示第  $i$  ( $i=1,2,L,N$ ) 个农村家庭的多维贫困剥夺得分,式 (4-1) 描述了社会资本 ( $Soc_i$ ) 对农村家庭多维贫困的影响。其中  $X_i$  表示控制变量,  $\beta_0$  为常数项,  $\beta_1$  表示核心变量社会资本对多维贫困剥夺得分的回归系数,  $\beta_2$  表示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varepsilon_i$  为随机误差项。

将式 (4-1) 用矩阵的形式可以表示为:

$$M = \beta X^T + \varepsilon \quad (4-2)$$

其中,  $M = (M_{pi})_{p=0}^2$ ,  $\beta = (\beta_0 \beta_1 \beta_2)$ ,  $X^T = (Soc_i x_i)^T$ ,  $\varepsilon = (\varepsilon_i)$ 。本文主要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 对该式进行估计。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剥夺得分 ( $M_0$ )。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原因在于: 多维贫困剥夺得分代表了农村家庭的被剥夺程度,若能将影响农村家庭被剥夺程度的因素研究透彻、找寻到有效降低农村家庭被剥夺程度的方法或途径,自然地,农村家庭多维贫困状况也能够得到有效缓解。

**解释变量:** 社会资本综合指数 (Soc), 本文借助因子分析法,从以下维度来衡量社会资本,一是信任与团结维度 (Soc\_1), 该指标主要考察农村家庭相互信任和团结的程度;二是信息获取传播维度 (Soc\_2), 该指标主要考察农村家庭信息获取与传播的渠道;三是集体行为维度 (Soc\_3), 该指标主要考察农村家庭参与集体行为的程度;四是社会网络维度 (Soc\_4), 该指标是农村家庭社会交往广度的一种具象体现,一个农村家庭人情礼支出较多,则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其社会交往较广。

控制变量: 为了将除解释变量以外的其他能够引起被解释变量变动的变量尽可能地控制好, 探明实证分析中的变量关系, 参照过往研究以及结合样本数据, 本文分别从家庭和村级层面控制了部分变量。其中家庭层面的变量包括: 家庭劳动力流动 (Labor; 您家是否有劳动力在外打工? 有=1, 否=0)、政府补贴 (Subsidy; 您家是否获得过政府各类补贴? 是=1, 否=0); 村级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民族 (Minority; 您村是否是少数民族聚居区? 是=1, 否=0)、自然灾害 (Disaster; 您村是否是自然灾害频发区? 是=1, 否=0)、矿产资源 (Diggings; 您村是否是矿产资源区? 是=1, 否=0)、农村家庭到最近集镇距离 (Dis\_jz; 单位: 里)、到本县县城的距离 (Dis\_xc; 单位: 里)、到省城的距离 (Dis\_sc; 单位: 里)。

中介变量: 本文在社会资本减贫传导作用的实证分析中, 涉及到 4 个中介变量, 包括: 信贷、正规信贷、非正规信贷 (Credit、Credit\_z、Credit\_f; 您家借钱时, 有没有被拒绝的经历? 有=1, 没有=0, 若选择选项“有”则该家庭存在信贷约束; 都被谁拒绝过? 若选择选项银行或者非银行正规金融机构, 则该家庭存在正规信贷约束, 有=1, 没有=0; 若选择选项亲戚、朋友或者民间借贷机构和个人, 则该家庭存在非正规信贷约束, 有=1, 没有=0)、非农就业 (None; 农村家庭非农劳动力数与成人数量之比)。

## 4.2 实证分析结果与结论

根据模型 (4-1), 本文采用 OLS 对其进行估计的结果见表 4.1。

表 4.1 社会资本减贫效应的实证结果 (OLS)

变量	多维贫困剥夺得分 $M_0$	
	(1)	(2)
Soc	-0.2218*** (-31.14)	-0.2198*** (-27.22)
Labor		-0.0214** (-2.32)
Subsidy		-0.0015* (-1.66)
Minority		0.0054 (0.30)
Diggings		-0.0188 (-1.15)
Disaster		0.0044 (0.37)
Dis_jz		0.0006 (0.86)
Dis_xc		0.0001 (0.72)
Dis_sc		0.0000 (1.30)
Constant	2.4999*** (35.04)	2.4916*** (30.99)
R-squared	0.5998	0.6725

从表 4.2 中可以发现,社会资本对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剥夺得分 $M_0$ 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农村家庭社会资本能显著缓解其多维贫困状况。

本文在关注社会资本综合指数的减贫效应的同时,也关注社会资本各维度的减贫效应,以便更具体和全面地了解社会资本的减贫效应。社会资本的信任与团结维度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了农村家庭之间的信任和团结能够显著影响其多维贫困状况;社会资本的信息获取传播维度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了农村家庭的信息获取与传播的渠道越丰富,其多维贫困水平越低;社会资本的集体行为维度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农村家庭参与集体行为的程度越高,其多维贫困的状况越轻微;社会资本的社会网络维度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了农村家庭的社会网络越广阔,其多维贫困水平越低。

运用乘积分布法检验信贷约束在农村家庭社会资本减贫中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是显著的;之后运用乘积分布法分别检验正规与非正规信贷约束在农村家庭的社会资本减贫中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二者均是显著的,并且比较二者的中介效应大小可知,非正规信贷约束在农村家庭的社会资本减贫中的中介效应要强于正规信贷约束。检验结果如表 4.2、4.3、4.4 所示。

表4.2 乘积分布法的检验结果

估计系数	标准误	95%置信区间
-0.0096	0.0042	[-0.0172 , -0.0034]

表 4.3 正规信贷约束乘积分布法检验结果

估计系数	标准误	95%置信区间
-0.0087	0.0054	[-0.0185 , -0.0012]

表 4.4 非正规信贷约束乘积分布法检验结果

估计系数	标准误	95%置信区间
-0.0074	0.0044	[-0.0153 , -0.0012]

采用 Sobel 法检验非农就业在农村家庭社会资本减贫中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是显著的。检验结果如表 4.5 所示。

表 4.5 非农就业 Sobel 法检验结果

Sobel-Goodman Mediation Tests
Percent of total effect that is mediated: 23.50 %
Ratio of indirect to direct effect: 0.3072

据此,本文有以下主要结论:社会资本具有显著减贫效应。社会资本的 4 个维度:信任与团结维度、信息获取与传播维度、集体行为维度以及社会网络维度都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农村家庭社会资本减贫效应的信贷约束缓解机制是可行且有效的;在农村家庭社会资本减贫



的两种信贷约束缓解机制中，非正规信贷约束缓解机制的作用要强于正规信贷约束缓解机制。农村家庭社会资本减贫效应的非农就业促进机制是可行且有效的。

为检验本章实证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取替换因变量的方式对其进行稳健性检验；在稳健性检验中，用因变量农村家庭是否多维贫困（是=1，否=0），来替换原因变量多维贫困剥夺得分（ $M_0$ ）。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验证了前文的实证结果与主要结论皆是稳健的。

## 5. 农村家庭减贫的对策建议

### 5.1 积极积累与维护社会资本

其一是增加贫困家庭的社会资本量。对于贫困农村家庭来说，当社会资本较为缺乏时，可以通过不同的手段和方式获取社会资本，达到增加社会资本量的效果。一是可以丰富农村居民交流平台，例如建设村民图书室、娱乐活动室等，由此可以增进农村家庭之间的有效沟通和交流，增强其所在的社会网络的凝聚力；二是可以通过牵头龙头企业、乡村能人与贫困家庭结成点对点的社会关系网络，帮助其积累社会资本量；三是建立农村互助通讯平台，切实为农村家庭提供积累和维护社会资本的渠道与途径。

其二是提升农村家庭维护社会资本的能力。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越用越有，不用则无”，即农村家庭的社会资本会随着家庭对其的使用而增多，也会随着家庭对其的弃用而消失，这体现了维护社会资本的能力对农村家庭的重要性。但能够通过对社会资本进行维护使其不断增加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运用社会资本的双方之间存在着互信和互利互惠效应。社会资本的积累与维护既与个体的努力有关，也是政府的职责所在。政府在此方面可以有多方面的作为，一方面对政府的信心有利于塑造互信，政府应持续在促进社会公平等方面做出有效努力和实际行动，例如切实保障农村家庭成员的受教育机会等，将有效增强社会信任，有利于积累和投资社会资本；另一方面，政府在提升农村生活水平方面的积极作为也能够实际意义上鼓励社会团结，比如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缩小城乡差距等，并进一步达成农村家庭成员能力的提升、农村家庭社会资本的积累与维护。

### 5.2 重视社会资本的减贫效应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还存在着部分正式制度有待加强的问题，自然地，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在我国乡缘、地缘、亲缘氛围浓厚的农村地区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有意识地构建新型社会资本发挥其减贫效应不容忽视。第一，可将社会资本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一种融入到农村家庭减贫的对策措施之中；第二，以家庭为单位构建家庭社会资本，参与多元主体共治非正式制度；此外，应针对不同地区的家庭实施不同的对策措施，据前文数据测算，我国西部地区社会资本综合指数在东中西部三个区域中最高，因此在西部农村家庭

减贫实践中,可以尝试就地取材、对家庭的社会资本多加以运用,加强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协同配合,提升农村家庭的内生发展动力,多维度地提高农村家庭的福利水平。

总体上,在相对落后的地区,应当充分考虑社会资本这类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力。基层政府要充分重视农村家庭的社会资本对减贫的重要作用,组织并支持农村人民结成互帮互助小组,充分发展其社会资本;此外,相关部门和主体可以借助农村家庭所处的社会网络,识别与追踪家庭的贫困状况,降低农村家庭返贫可能性。

### 5.3 提升减贫传导机制的有效性

前文中,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厘清了农村家庭社会资本减贫的传导路径,农村家庭社会资本除了能够直接发挥减贫效应外,还能通过信贷约束缓解和非农就业促进两条传导路径间接发挥减贫效应。进一步地,厘清社会资本减贫的传导机制,从中介环节入手,提升社会资本减贫传导机制的有效性,有利于更加充分地利用和发挥社会资本地减贫效应。

其一是发挥金融在社会资本减贫实践中的作用。农村家庭的信贷获取主要来源有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两大类;社会资本为农村金融提供了信息传递的功能,降低了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如前文所述,农村非正规金融更能够充分运用社会资本的优势与其提供的信息,完成借贷双方的交易行为;正规金融机构除了通过深化自身改革来改善其支农服务功能以外也可以借鉴非正规金融的模式,在对农村家庭贷款申请审核时,除了考虑其抵押担保物等硬性指标外,还可以尝试社会评价、社会声望等软性指标,以此得到对于有信贷需求家庭的较为全面和综合的评价。这具有着双赢意味,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有利于其扩大客户群体;对于贷款家庭来说有利于其获取信贷资金支持,由此共同促进金融发挥好其在后脱贫时代中的作用。另外,堵不如疏,相关监管部门应当重视其在农村家庭减贫中的积极作用,积极引导合规的非正规金融加入扶贫体系中来,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减贫作用,实现“造血”式减贫,让金融作为社会资本减贫的有效路径,为农村家庭赋能。

其二是发挥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在社会资本减贫实践中的作用。社会资本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提供了中介功能,降低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信息获取成本,增加就业信息传播,从而避免加重其贫困状况。因此,农村家庭减贫可以通过构建社会资本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进而影响家庭贫困状况。其次,应当重视农村劳动力的自我发展,畅通农村劳动力流动沟通渠道,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提供便利,让其在参与非农就业获取更丰富收入来源的同时,自身发展能力同时也能有所提升,进而提升所在农村家庭的内生发展动力,将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摆脱相对贫困,使得农村劳动力能够合理有效流动,实现非农就业作为社会资本减贫的有效传导路径,进而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减贫效应。

### 5.4 提高家庭多维度福利水平

其一是继续提高农村家庭收入水平。从我国国情来看，消除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首先就需要帮助农村低收入人群实现“收入倍增”。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向入手：加快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承包及所有权三权分置，实现农村土地的有效流转；尝试引入龙头企业及先进技术，促进农村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进而带动剩余劳动力就近就业以提高收入；相关部门可针对当地的资源禀赋特征，落实和推进“一村一品、一乡一业”产业格局战略，逐步形成农村地区专业化生产格局，促进农村家庭收入专业化，实现永久性脱贫目标。

其二是完善农村地区环境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起点阶段，农村地区依然是改善民生的主要战场。农村地区环境建设分为农村地区“硬环境”建设和“软环境”建设。“硬环境”建设指农村地区各项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我国在这一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但由前文测算的单维贫困发生率可知，我国农村地区在做饭燃料和做饭用水等指标上的贫困发生率仍然较高。因此，应当继续完善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加大改善农村地区居民卫生设施、生活设施、居住环境等相关基础设施的力度，提升农村家庭生活质量。“软环境”建设则主要指农村地区乡风文明建设，在这一方面要激发农村居民主人翁意识，提高其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主动意识，增强其参与乡村社会共治的责任感，同时要健全村规民约，完善村民自治各项制度，以乡风文明之魂引领乡村振兴之路。

其三是继续强化农村地区教育培训。教育培训机会是一个家庭内生发展动力的源泉，教育均衡亦是最大的社会公平，而如今从现实情况来看，实现义务教育均衡以及教育培训机会公平在农村地区依然是重点难点。根据前文的数据测算结果可知，教育维度对农村家庭多维贫困的贡献度较大，因此提升农村家庭教育水平是缓解多维贫困的重要着眼点。第一，在物质方面持续加强对教育培训的支持力度，切实保障农村地区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相应权利，避免因贫失学辍学；健全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体系，为其提供学习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充足机会。第二，推动形成较为完善的教育扶贫体系，针对义务教育推动形成“学校——教师——学生”的教育扶贫体系；针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形成“政府——基层组织——劳动力”和“政府——企业——劳动力”的教育培训扶贫体系，加快缩小区域间教育培训发展差距，增强农村家庭的总体素质和能力。

其四是优化农村地区医疗保障制度。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因病致贫返贫是其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针对农村地区“看病难、看病贵”以及因病致贫返贫等实际问题，可尝试建立由财政部、民政部及相关扶贫部门等参与的健康扶贫长效机制，对常见疾病的贫困人群按照疾病类别进行精准识别和追踪管理；通过专项资金拨款等推进农村家庭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保障制度全覆盖；同时加强农村地区医疗卫生设施建设以及基层从业人员素质培养，保证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医疗权益。

#### 参考文献

- [1] Grootaert C. Social capital, household welfare, and poverty in Indonesia [J].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2002, 11(1):4-38.
- [2] 罗连发,叶初升.社会资本、技术采用与扶贫政策质量——基于计算经济学的仿真分析[J].财经科学,2015(02):100-110.
- [3] Alkire S, Foster J. Count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11,95.
- [4] 刘一伟,汪润泉.收入差距,社会资本与居民贫困[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7,034(009):75-92.
- [5] 胡伦,陆迁,杜为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多维贫困影响分析[J].社会科学,2018(12).
- [6] 孙永苑,杜在超,张林,何金财.关系、正规与非正规信贷[J].经济学(季刊),2016,15(02):597-626.
- [7] 余泉生,周亚虹.信贷约束强度与农户福祉损失——基于中国农村金融调查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4,000(003):36-47.
- [8] 蒋乃华,卞智勇.社会资本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来自江苏的实证[J].管理世界,2007(12):158-159.
- [9] 胡荣.社会资本与地方治理: Social capital and local governance[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 [10] Iacobucci D.Mediation analysis and categorical variables: The final frontier[J].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2012, 22.

## Research on the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Social Capital of Rural Family

Sun Jian

(College of Finance and Statistics,Hunan University,Changsha/Hunan,410079)

**Abstract:** China is a human society. The social network, trust, solidarity and participation formed by rural families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subsequent social capital such as convenient resources and information are important resources that rural families can obtain and control.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blood-making" poverty reduction thinking, research on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reducing poverty in rural household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he research of this article is about the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social capital in rural households: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social capital.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social capital of rural households and its four dimensions: the trust and solidarity dimension of social capital, the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nd dissemination dimension, the collective behavior dimension, and the social network dimension all have significant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s; the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shows that rural families of social capital can exert its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through the credit constraint mitigation mechanism

and the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promotion mechanism, and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the formal credit constraint mitigation mechanism is stronger than that of the informal credit constraint mitigation mechanism. And further targete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poverty reduction in rural families.

**Keywords:** Rural households, social capital;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multiplicative integration method; Sobel method

**作者简介 (可选):**

孙剑 (1996-), 女, 硕士研究生,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 研究方向: 金融管理、农村金融